

投票行为理论视角下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

彭 泉

【内容提要】 民粹政党自转型之初就在中东欧各国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随新自由主义的深入发展而更加繁荣，在选举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显著影响地区政治生态。本文通过投票行为的相关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影响选民投票动机的因素。研究发现，生产系统转型在一些中东欧国家造成了人口结构向保守和本土主义的转变，构成民粹支持者的身份基础；转型的“非人民性”未使民众对代议民主和主流建制建立起忠诚与依赖，而“转型性衰退”和对各种危机的处理不当使主流政党产生绩效赤字；包袱更小的民粹政党通过各种提升政治正当性的策略，以提高其投资附加值，选民将票投给预期回报更大的民粹政党；在转型质量较差的中东欧国家，政党系统分裂度高，选举波动性强，为边缘民粹政党提供了更多得到选民关注的政治机会。本文选择保加利亚民粹政党的兴起进行案例分析，较好支持了研究假设，使中东欧民粹政党兴起的解释更为充分和科学。

【关键词】 中东欧；民粹政党；投票行为；政治转型；保加利亚

【作者简介】 彭泉，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维谢格拉德集团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邮编：200020）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1.03.008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1）03-0136-19

* 感谢《国际论坛》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中东欧转型三十年来,围绕“转型是否已完成”、“转型在中东欧是否获得成功”等问题的争论始终喋喋不休。大部分西方学者基于经济指标、政治指标和机构指标等,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早已完成,走上西方现代化之路。中国学者则更为谨慎,虽认同转型已完成,但还是提醒中东欧转型及后续矛盾应被持续讨论和反思。^①随着西化的深入,中东欧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断繁荣,成为与新自由主义转型共进的反向力量。2008年多危机时代来临,在检验头二十年转型质量的大考中,中东欧兴起一轮更大声势的民粹潮。据克劳斯·冯·拜梅(Klaus Von Beyme)的观察,转型三十年来中东欧民粹政党从来都在政治核心,而非边缘,这点不同于西欧。^②因而从反向视角观察,中东欧转型虽已完成,但其引发的矛盾问题更值得注意。孔寒冰指出,这种矛盾应是转型后社会曲折发展的一种表现。^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粹政党的上台是选民“用脚投票”的结果。因此,本文试图反思过去三十年中民主转型与“民主倒退”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否中东欧在转型期存在某些问题,或转型在制度设计及演进路径上存在某些因素,为后续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提供机遇?选民何以选择民粹政党?

一、转型以来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

中东欧民粹是90年代后全球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④不同于19世纪末在美国、俄国出现的第一代民粹,也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以拉美左翼民粹为代表的第二代民粹,当前“新民粹主义”接受民主的制度规则,但质疑资本主义自由化,中东欧遭遇深刻的“民粹—威权”转折(populist-authoritarian change)。学者指出,

① 参阅黄立菲、杨喆:《中东欧转型研究中待深入探讨的六个问题》,《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134—140页;朱晓中:《转型三问——写在中东欧转型30年之际》,《当代世界》2019年第4期,第24—28页;项佐涛、李家懿:《中东欧转轨三问——30年历程的回顾与反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第83—91页;孔田平:《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与挑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第60—72页。

② Klaus von Beyme, “Rechtsextremismus in Osteuropa,” (《东欧的右翼极端主义》) in Jürgen W. Falter et al. eds., *Rechtsextremismus*, (《右翼极端主义》)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1996, pp.423-442.

③ 孔寒冰、韦冲霄:《中东欧研究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孔寒冰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3期,第126—160页。

④ 徐刚:《中东欧社会转型中的新民粹主义探析》,《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52—69页;张莉:《多样的欧洲民粹主义及其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国际论坛》2019年第1期,第62—75页;林红:《后冷战时代的欧洲新民粹主义》,《国际论坛》2005年第4期,第12—16页。

自1995年以来，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水平已现退化迹象，威权思想逐步蔓延。^①以斯洛伐克总理弗拉德米尔·梅恰尔（Vladimír Mečiar）及政党“人民党—斯洛伐克民主运动（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 HZDS）”为代表的民粹力量定义了转型以来地区政治逐渐普遍化的面貌。因此在转型十年后的2000年左右，中东欧国家的民粹政党就已达到9.2%的平均投票份额，12个民粹政党参与竞选，有两个国家的民粹政党在选举中支持度超过20%。^②2008年西方多危机时代来临，民粹政治在后转型时代的中东欧更为繁荣。2017年，民粹政党的选票份额上升到31.6%，并且在选举中还出现了民粹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表明主流政治逐渐被抛弃，民粹主义成为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常态。

民调指出，中东欧民众对危机的恐惧要强于其他西方国家。^③对失业、福利、难民等议题的焦虑不仅为民粹政党的上台提供机遇，还表明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危机应对机制，更意味着民众对主流建制的信心不足。当2018年后西欧、北欧的民粹政党随社会秩序复苏已显露衰退迹象的时候，中东欧民粹依然强势。从宏观视角看待转型以来中东欧的民粹现象，其像新自由制度中一根难以拔除的楔子，总体反映了“从历史的终结到后历史终结（post-end of history），西方政治正在受到的严峻挑战”。^④

二、中东欧民粹政党兴起的理论解释

从因果上看，学者普遍以如下四个视角来解释转型以来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与强势。第一，历史文化视角。有学者认为当前中东欧的民粹主义是对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复制。^⑤另有学者指出当前的民粹政党受苏东时代共产党执政时期政治文化的影

① Freedom House, “Nations in Transit 2017: Report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nations-transit/nations-transit-2017>

②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 *European Populism: Trends, Threats, and Future Prospects*, 2017.

③ 参见皮尤2018年的两份调研数据以及《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份调查数据 https://www.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FT_18.12.10_MigrationViews_Topline2.pdf; https://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2018/09/18141059/FT_18.09.19_AttitudesRefugees_Topline.pdf; The Economist, “Europeans Remain Welcoming to Immigrants”, April 19, 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18/04/19/europeans-remain-welcoming-to-immigrants>.

④ Viktor Jakupec,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Viktor Jakupec, *Development Aid-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the Neoliberal Agenda*, Wiesbaden: Springer, 2018, chap.1.

⑤ Béla Greskovits,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East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Transformations Compared*, Budapest: CEU Press, 1998; Slavoj Žiž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32, No.3, 2006, p.553.

响。^① 还有学者试图寻找当前中东欧民粹主义与历史上农民民粹之间的关系。^② 此外，转型后宗教迅速回归人们的生活，未经改革的天主教与东正教信仰繁荣，民众对宗教痴迷，推崇保守的文化价值。^③ 从该视角来看，学者总体上聚焦于中东欧民粹威权文化特征的缘起。第二，民族地缘视角。中东欧是一个地理划分和民族构成复杂的区域，民族国家长久处于身份变动中，这种不确定性使中东欧国家对地缘政治的反应极为敏感，一些民族试图建立国家身份从而引发民粹。^④ 如姜珺指出，正是独立国家地位的长期缺失导致斯洛伐克民粹政治的兴起。^⑤ 波罗的海国家则试图以反俄与反俄裔为基点来建立民族与国家的独立身份，反而为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铺路。^⑥ 从地缘上看，中东欧的民粹主义还受到相邻国家民粹力量的影响，如文化传播、制度散播、跨国贸易、人员往来、知识共享和历史遗产等。第三，政治制度视角。姬文刚指出，中东欧政党政治在政党格局、政治系统、政党政府、政治沟通、政党领袖等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民粹政党的兴起。^⑦ 因此制度视角包括转型的内部矛盾与转型的具体结果两方面刺激因素。学者指出，由于惧怕边缘化，前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精英、本国较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等就会尝试在各政治力量均较为衰弱的转型期煽动选民，以便延长或暂停改革，避免边缘化。这将导致整个政府治理形式的民粹化，并对后续执政党的治理形式产生影响。^⑧ 中东欧民主制度建设普遍较弱，权力碎片化，对司法不公等制度建设的不满也会为民粹政党的兴起提供机会。^⑨ 转型还在制度与法治上带来腐败问题，使单一

① Erazim Kohák, "Consolidating Freedom in Central Europe," *Dissent*, Vol.44, No.2, 1997, pp.21-26; Jiri S. Melich, "'The Post- Communist Mind': Socio-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Communist Lega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in Eastern Europe," in Zeljko Ševic, Glendal Wright, eds.,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ograd: YASF-Student Cultural Centre, 1997, pp.20-41.

② Juraj Buzalka, "Europeanisation and Post- Peasant Populism in Eastern Europe," *Europe- Asia Studies*, Vol.60, No.5, 2008, pp.757-771.

③ Sabrina P. Ramet,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

④ Attila Ágh,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Europ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9.

⑤ 姜珺:《转型时期斯洛伐克民粹主义探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1期,第21—29页。

⑥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53.

⑦ 姬文刚:《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新变化、成因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0年第4期,第29—34页。

⑧ Jacek Wasilewski, Edmund Wnuk-Lipinski, "Poland: Winding Road from the Communist to the Post- Solidarity Elite", *Theory and Society*, 1995, 24(5), pp.669-696.

⑨ Béla Greskovits,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East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Transformations Compared*, Budapest: CEU Press, 1998, p.23.

反腐议题的利基型（niche）民粹政党得以兴起。^①第四，经济全球化视角。该视角为民粹兴起提供了最有力的解释。中东欧市场经济转型是激进且彻底的，在短期内造成了失业加剧、民生下降、收入不均等问题，而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情况也未见好转，“转型性衰退”与“入盟综合征”使民众对经济的不满转化为对民粹政党的支持。^②朱晓中指出，中东欧转型以来经历多场危机，经济因素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③而入盟对中东欧民粹主义的激发和壮大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欧盟东扩带来了更自由的人员流动，“去地方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本地主体民族的认同受到严峻挑战，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民粹政党在供给上的必然选择。^④由于全球化带来经济危机、福利危机、移民与难民危机，民粹政党借此在反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笼络民心。^⑤

基于前人的分析，我们看到转型后一些领域确实存在问题，使民众不满，成为刺激中东欧民粹政党兴起的因素，学者也基于各自视角研究，但有个问题始终没得到关注。从逻辑上看，民粹政党在选举中获得民众支持是个选举结果，结果必然需由行动引发。^⑥无论是失业、腐败或民族隔阂，至多只能说明选民在这些领域有反建制的议题需求。民粹政党是议题驱动（issue-driven）的，基于某些显著性议题而反精英或反建制，炒作议题可以带来良好的竞选结果，“不满”自然是解释民粹政党兴起的通用方案。^⑦但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民粹政党在选举中得到选票。一方面，基于民粹政党兴起的“供需逻辑”，民粹政党需有充分的政策供给以满足选民需求。^⑧如综述所列，目前的研究已有相当程度的说明。另一方面，包括选举规制、选民构成和选民心态等与投票行为

① Peter Učeň, “Parties, Populism, and Anti-Establishment Politic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7, No.1, 2007, pp.49-62.

② 【匈】亚当·法布斯：《自由主义者梦想的破灭——1989年以来匈牙利演变的轨迹》，《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第99—104页。

③ 朱晓中：《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三重危机》，《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6期，第18—28页。

④ Ben Cahill, “Of Note: Institutions, Populism, and Immigration in Europe,” *SAIS Review*, Vol.27, No.1, 2007, pp.79-80.

⑤ Jacques Rupnik, “Explaining Eastern Europe: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9, No.3, 2018, pp.24-38.

⑥ 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 and 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第33—59页。

⑦ Bart Bonikowski, Daphne Halikiopoulou, Eric Kaufmann, Matthijs Rooduijn, “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 Scholarly Exchang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25, No.1, 2019, pp.58-81.

⑧ 彭泉：《当代欧洲民粹政党的兴起：基于“供需机制”的解释》，《国际观察》2019年第6期，第105—134页。

直接相关的问题也是民粹政党兴起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因素也多由制度转型及其衍生问题，还有民粹政党的策略等引发。目前相关的研究是较为欠缺的。如下图所示，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 A 路径，本文要解释的是基于投票行为的系统性路径 B，使我们能充分理解从“制度转型”到“民粹政党兴起”的科学机制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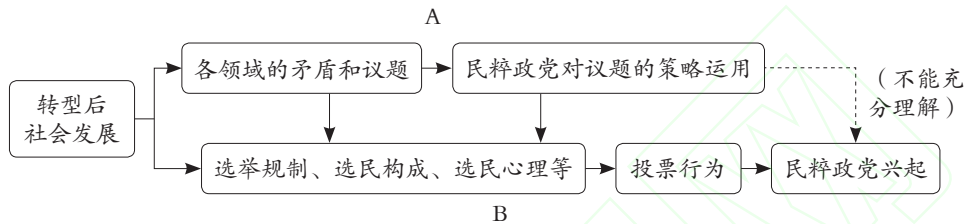


图 1 中东欧民粹政党兴起的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理解中东欧民粹政党兴起中的选民投票行为

在转型后实行多党选举的中东欧，选民的投票行为（voting behavior）直接导致不同的选举结果，为不同的政党提供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政治机会一词由皮特·艾辛杰（Peter Eisinger）所提出，它描述各类政治团体有多大可能和多大能力获取权力并掌握政治系统。^①对民粹政党而言，政治机会是政治斗争过程中潜在的前提条件，任何政治行为都嵌在广阔的政治社会视野中，争取选民的选票是获得政治机会的唯一路径。在政治斗争中，民粹政党强调人民大众和精英建制是对立的两个群体。^②获得公众的首肯，不仅意味着民粹政党的代表性得到认可，从政治外围进入核心地带，还意味着通过将政治回归于人民的种种行动，提高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并通过塑造政党与选民间理念的一致性，弥合主流政治下的代表性缺失。因此，丹尼尔·卡拉曼尼（Daniele Caramani）敏锐地指出，作为平头百姓的代言人，民粹政党亟需选票赋予其正当性。^③

① Peter K. Eisinger,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7, No.1, 1973, pp.11-28.

② Daniele Albertazzi,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and the Sceptre*, London: Palgrave, 2008; Ben Stanley, “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13, No.1, 2008, pp.95-110.

③ Daniele Caramani, “Will vs. Reason: The Populist and Technocratic Forms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ir Critique to Party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111, No.1, 2017, pp.54-67.

民粹政党对选票的渴望是非常明确的，但选民的投票行为取决于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如政党认同和忠诚、候选人的人格魅力、族群或宗教等显著性议题的影响、媒体的推波助澜等。总结起来，投票行为有三个理论流派。第一，社会政治学派。认为选民具有社会团体身份，因此按照选民的性别、年龄、阶层、宗教等进行划分，从而通过选民的基础构成（demography）与分布（cleavage）理解某个类型团体的选举偏好。^①第二，社会心理学派。学者认为投票行为是选民心理的反应，如失望、愤怒、焦虑等都会影响其预期和选择，特别是选民忠诚。^②而党派既往的执政表现等也会影响选民心理。第三，理性选择学派。认为选民投票基于成本和收益而来，选民对基于选举效益最大化的预期选择党派。^③此外，各国制度转型对政党竞争的限制不同，如选举门槛的高低设置、对极端政党是否有立法限制等将决定边缘民粹政党是否能够进入民众视野并得到支持，因此除了选民身份构成、选民心理偏好和成本收益考量之外，不同国家的选举规制也是引发不同投票行为的一个硬性指标。从关系上看，上述四个理论观点囊括了选民投票行为所涉及的因素，如选民的身份构成、选民的情感动机或理性判断，以及选举的体系结构带来的政治机会。因此张亲培指出，投票行为的各流派“是不同视角的转换、不同观点和范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过程。”^④本文借上述成熟观点与中东欧民粹现实形成假设，分析转型后中东欧选民对民粹政党的投票行为。并以保加利亚的民粹政治实践作为案例佐证，对假设予以检验。

（一）转型使人口结构发生利于保守主义的变化

基于大样本定量分析，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研究发现，年长者、男性、低教育者、低收入者、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自人口多数民族的人等有较高的比例支持民粹政党。^⑤他们通常有反对移民的态度，不信任全球和国家治理，支持威权主义，在

① Clem Brooks, Paul Nieuwbeerta, Jeff Manza, “Cleavage- based Voting Behavior in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 Evidence from Six Postwar Democrac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35, No.1, 2006, pp.88-128.

② Peter Schofield, Peter Reeves, “Does the Factor Theory of Satisfaction Explain Political Voting Behaviour?”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49, No.5/6, 2015, pp.968-992.

③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④ 张亲培：《投票行为研究的发展及范式的转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77页。

⑤ Pippa Norris, *Radical Right: 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右翼立场上有明确的自我定位等。^①在西欧和北美，具有这些保守特征的个体显著地与拥戴世界主义的个体区分，形成势均力敌的群体对立。但在中东欧，这种均势是被打破的。生产系统（production system）转型使保守人群越来越多，并使开明的中产和知识分子加速外移到西欧与北欧。生产系统转型包括社会资源分配的转变，生产活动方式的转变，人类知识的转变等。^②2007年至2018年，除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捷克之外的中东欧国家都出现了人口向西欧和北欧超速外移导致劳动力失衡的情况。市场经济下，生产系统的偏好取决于消费者。当考虑到世界市场对生产的需求及价值，无论个体还是企业，都会将经济活动投入到回报率和工资更高的领域和地区。在一些中东欧国家，由于竞争力薄弱，只好将能源和原材料作为经济活动的首要方向，这将严重破坏国民经济。^③转型后高附加值领域的民族企业一直面临资本、人力等方面的不足。面对西欧强势的资本入侵，中东欧消费性产品的竞争力严重缺乏，生产和贸易等经济关系固化，年轻与高知劳动力大量流失。^④相反，低收入、低教育、年长的，甚至被精英政治抛弃的人留在本土，通过民粹政治力量形成新的身份认同。假设1：中东欧转型使人口结构利于保守认同的形成，本土主义声势强大，在选举中投票给民粹主义政党。

（二）民众对主流政治忠诚度不够，并被民粹政党引导情绪

剧变后重新建立的民主制度造成了政党林立、政府脆弱、议会更迭频繁等问题。由于转型过于迅猛及对转型中不同策略和过程缺乏认知，中东欧民众难以定位自身利益和政治观点，在政党选举中表现得较为突出。面对转型各领域迅速发生的不确定性变化及与预期不相符的结果，选民、政党和议员常会在不同的选项中徘徊不定，最终影响选举结果。第一，转型缺乏透明性。社会大众对转型认识不足、参与的程度不够，使政治格局和政党制度不稳定的情况频发。西方现代化理论强调“功能性精英”是转

① Ronald F. Inglehart,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6, RWP16-026.

② Niels Mygind, "Different Paths of Transition in the Baltics," in Borge Dahl, Rei Shiratori, eds., *Law, Economics and Business in the Melting Pot: The Cas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Baltic States*, Tokai University European Center/ CBS, 1997, pp.1-39.

③ Gordon Hughes, Paul G. Hare, "Industrial Policy and Restructuring in Eastern Europ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8, No.1, 1992, pp.82-104.

④ Benjamin Elsner, "Emigration and Wages: the EU Enlargement Experiment,"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6111, 2011.

型的绝对主导。^①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大众在中东欧政治中都是不存在的。因此，热衷于参与政治的人远低于欧洲其他地区，参与投票的情况不仅不理想，且逐年下降，表明民主政治对公众的吸引力不足，对主流政党的忠诚度不够。^②第二，转型意味着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发生“人事变动”，但许多原先政府官员还继续留任于重要位置。他们既是旧制度的掌管者，又是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势必要确保自己原先的权力能够帮助其在新制度下获得资源。“野蛮私有化”指的正是这些人通过个人权力和特殊位置将国有资本私有化于囊中，滋生腐败不公，各方利益难以平衡。民众对转型后的精英阶层存在不满，而市民社会又极为弱势，“非公民性（uncivicness）”的转型遗产使民众走向大众型民粹政党。第三，中东欧多国的转型性衰退与疲于应对后转型时代的多重危机伤害了民众利益。数据表明，转型至今有10%到19%的中东欧人脱贫后又再度返贫。^③衰退期的中东欧居民生活满意度不佳，造成政治信任危机。^④在民众对主流政治的不信任之下，民粹政党利用媒体、领袖和社会动员策略等，放大民众负面情绪。^⑤假设2：转型后、特别是多危机以来，民众对主流政党、精英建制和民主制度缺乏根本性忠诚和认同，负面心理被善于利用各种策略的民粹政党不断放大，在选举中倾向于选择疑欧主义的反建制民粹党派。

（三）主流政党绩效不佳，民粹政党附加值高

中东欧民众之所以选择民粹政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主流政党绩效不佳的考量，从而放弃对主流建制的正当性授权。首先，选主流政党的代价大，选民粹政党的成本收益比更高。杰吉·豪斯纳（Jerzy Hausner）对转型期的中东欧有过细致分析，发现成本高负担重、而结果并不那么成功的转型会引发民粹主义。^⑥而主流政党的绩效是重要因素。主流政党长期扮演政府掌权人的角色，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和资本主义

^① Johann P. Arnason, “Designs and Destinies: Making Sense of Post-Communism,” *Thesis Eleven*, Vol.63, 2000, pp.89-97.

^② Mikolaj Czesnik, “Voter Turnout and Europe-related Policie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9th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Challenges for Democracy in a Global Era, 7-9 April, 2009, The Manchester Conference Centre.

^③ 马细谱、李少捷：《中东欧转轨25年：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④ Richard A. Easterlin, “Lost in Transition: Life Satisfaction on the Road to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71, No.2, 2009, pp.130-145.

^⑤ Klaus von Beyme, *Rightwing Populism: an Element of Neodemocracy*, Wiesbaden: Springer, 2019, p.18.

^⑥ Jerzy Hausner, “Populist Threat in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No. 29, Warsaw: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1992.

制度的守门人，因此在转型之初拥有较高的正当性基础。但随着主流政党政治技能不足的缺陷逐渐暴露，特别是在面对多议题危机之时无力下手，民主与法治运转开始失灵，政府与社会的负担日益严重，同时主流政党作为转型“正确路线”的代言人难以改弦更张。因此选民继续投资主流政党的收益较低。而民粹政党多为边缘型的新党，不存在既往绩效累积的负担，也不考虑制度转型的“正确路线”，甚至要为民众道德解绑，还民众财务自由，与欧盟、债权人和人权组织为敌。选民选择民粹政党的预期收益更高。第二，作为异质性力量，民粹政党的涌现对主流建制的正当性形成极大的挑战。正当性（legitimacy）简言之，表明了某政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民众的认可，也是选民投资某个政党的重要考虑因素。克莱格·马西森（Craig Matheson）提出正当性的八个来源：传统（convention）、契约（contract）、普遍性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s）、神圣性（sacredness）、专业性知识（expertise）、公众赞成（popular approval）、掌权者与权力客体间的私人关系（personal ties）、以及掌权者的个人素质（personal qualities）。^①民粹政党逐渐在上述八个方面取代主流政党，使自身具备投资的“高附加值”：既是民族传统和宗教的代言人，又逐渐形成掌握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团队，还通过魅力领袖与民众打成一片。假设3：由于主流政党绩效不佳，政治正当性下降，而民粹政党在正当性获取上更能响应民众，使民众看到投资民粹政党的良好收益，从而得到选民青睐。

（四）转型后政党政治分裂程度高，选举波动性强

从选举规制上来看，民粹政党的政治机会也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制度设计（institutional design）一词来自艾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等学者，指竞选场上重要党派的数量、选举系统的设计、政府组阁或构成的模式等。^②中东欧转型后普遍存在制度建设的软肋，如选举门槛设置较低、对极端政党的限制不够、对原共产党继任党的压制过大、对恶性竞争的立法限制不足等。在多党制的中东欧，这些问题导致转型后中东欧选举波动性（volatility）普遍较高。基于多党竞争的政治现实，学者普遍指出选举中波动性的强弱对民粹政党的政治机会造成影响。选举波动性是指，由于政党系统发生了网络性变化，引发选民在每届选举中投票的变化及政党对选举结果不

^① Craig Matheson, "Weber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Forms of Legitimac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38, 1987, pp.199-215.

^② 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6-28.

确定性的预期。^①即为两届选举之间各个党派的选票变化幅度的总体统计,及对新老党派熙来攘往程度上的客观描述。它是政党体系稳定与否的最重要标志,选举波动性强甚至意味着民主选举制度的衰败(decay)或发生动荡(upheaval)。^②选举波动性强在三个方面为民粹政党提供机会:一是边缘政党有更多进入选举场的可能;二是政党改组成本低,改头换脸新党派多;三是选民对政党或民主制度的认可度较低,导致政党频繁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基于彼得森指数(Pedersen Index)这一通用的选举波动性指标,中东欧国家高达42,而西欧平均仅为11。在转型后的1990年至中东欧国家首次入盟的2004年间,中东欧国家每届选举平均有5.6个新党派加入竞逐,斩获19%的选票。^③此外,只有37%的民众忠诚于某一政党,这一数字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为54%。^④88%的中东欧政党都出现票数减少的情况,平均失票率为15%,该数字为成熟民主国家的五倍之多。^⑤面对建制党高昂的选举投入及过去累积的选举资本,在相对不完善的竞选制度下,新党派博出位、冒险采取出格的民粹策略更有助于吸引眼球。^⑥假设4:作为结构性因素,由选举波动性反映的选举规制的完善与否为民粹政党的涌现提供制度性机遇,并得到选民的关注与支持。

上述四个方面分别讨论了选民的身份构成、心理偏好、成本收益和选举规制等投票行为的关键因素,有助于理解中东欧选民何以选择民粹政党。

四、案例研究:转型以来保加利亚民粹政党的兴起

保加利亚是近代民粹政治较为繁盛的国家,转型后民粹政治也迅速进入人们的视

^① Mogens N. Pedersen,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hanging Patterns of Electoral Volat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7, No.1, 1979, pp.1-26.

^② Adam Przeworski,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Voting Patterns, or is Mobilization the Source of Deca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9, No.1, 1975, pp.49-67.

^③ Scott Mainwaring, Ana Maria Bejarano, Eduardo Pizarro Leongomez,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Andes: An Overview," in Scott Mainwaring, Ana Maria Bejarano, Eduardo Pizarro Leongomez, eds.,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And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rgit Tavits, "Party Systems in the Making: The Emergence and Success of New Parties in New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8, No.1, 2007, pp.113-133.

^④ Russell J. Dalton, Stephen Weldon, "Partisanship and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Party Politics*, Vol.13, No.2, 2007, pp.179-196.

^⑤ Andrew Roberts,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Public Preferences and Policy Refor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3.

^⑥ Margit Tavits, "On the Linkage between Electoral Volatility and Party System Instabil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7, No.5, 2008, pp.537-555.

野。一方面，保加利亚的转型存在较多问题。2015年，欧洲统计局的调查认为，保加利亚经济转型失败、政府问题丛生，称之为“不快乐的转型”。^①作为欧洲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腐败问题严重。对转型后多领域议题的不满形成了民众的反建制需求。另一方面，保加利亚的民粹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安娜·克拉丝特娃(Anna Krasteva)指出，保加利亚的民粹是后共产时代中东欧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是一种高度效仿的结果，“极端主义不是自发且内生的立场态度，而是一种习得的政治游戏，是对通过特殊手段获胜的政党的模仿”。^②从这两个案例选择的标准看，保加利亚能够提供较丰富的研究素材。

(一) 转型后保加利亚民粹政党的发展历程

1. 第一波浪潮(1989—2001年)：民粹政党的登场

转型初期保加利亚政党政治由主流政党把持，以左翼社会党(Bulgarian Socialist Party, BSP)这一共产党的继任党、右翼的民主力量联盟(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 SDS)、权利与自由运动(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s, DPS)这一土耳其裔政党等为代表。在权力真空的转型初期，主流政党为获得选民支持往往采取互相攻讦的手段，如社会党指责民主力量联盟为“深蓝色的同类相残(dark blue cannibalism)”，民主力量联盟指责社会党为“粉红色的洗脑生物(pink brainwashed creatures)”。^③没有政治共识，民众处于观望和迷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乔治·甘切夫(George Ganchev)及其领导的民粹政党“保加利亚商业同盟(Bulgarian Business Bloc, BBB)”通过抨击主流政党为“议会骗子”在选举中获得出人意料的支持。保加利亚商业同盟党在1994年选举中获得4.7%的选票，获得13个议席；1997年该党获得4.9%的选票以及12个议席。甘切夫在1992年和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两度获得第三的好名次，支持率分别为16.8%和20.9%。保加利亚民粹政党开始登场。

2. 第二波浪潮(2001—2009年)：民粹政党逐渐走向主流

整个九十年代的保加利亚，社会党与民主力量联盟的交锋是主流，两党互有胜负，民粹政党在夹缝中朝政治中心区域进发。然而主推私有化的民主力量联盟频频爆发腐

^① Eurostat, “How satisfied are people with their liv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 March, 2015,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6750366/3-19032015-CP-EN.pdf/bbf302b1-597d-4bf0-96c4-9876e49b5b9d>.

^② Lilia Raycheva, Dobrinka Peicheva, “Populism in Bulgaria Between Politicization of Media and Mediatization,” *Mediatization Studies*, Vol.1, No.1, 2017, pp.69-81.

^③ Christiana Cristova, “Populism: The Bulgarian Case,” *Societate e Cultura*, Vol.13, No.2, 2011, pp.221-232.

败丑闻，被指通过私有化中饱私囊。甚至有位民主力量联盟的部长被人叫做“百分之十先生”，即在每笔私有化交易中抽10%的利。^①而1996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给了保加利亚以重创，货币贬值严重，通胀率高升，人们对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深度自由化转型的路线产生怀疑。2001年，保加利亚发生一场政治地震，民族运动党（National Movement, NDSV）及西美昂二世（Simeon II）这位“后社会主义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民粹领导者”强势袭入保加利亚政坛。^②该党在选举中获得42.74%的选票。2005年，融合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攻击党（ATAKA）异军突起，反欧盟、反北约、反外国资本、反少数民族，要求“将保加利亚还给保加利亚人”，建立“一个庞大且单一的保加利亚民族国家”。民粹政治渐入佳境。

3. 第三波浪潮（2009年至今）：民粹政党实现“主流化”

随着转型走到后期，以及2008年多危机时代的开启，保加利亚的民粹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06年成立的欧洲发展公民党（Citizens for European Development of Bulgaria, GERB）开启了保加利亚政治的新纪元，2009年至2017年的四次大选该党均获首位，三次领导组阁；2007年至今的四次欧洲议会大选，该党也为保加利亚获得欧洲议会席位最多的政党。体现了选民对该党高度的认可。利用转型的多领域问题，对更广泛议题的运用和折中处理是其获得更多支持的原因。该党抓住了保加利亚民众急迫的需求，集中于欧洲一体化、打击腐败、打击犯罪、刺激经济和生产、社会公正、农业问题、少数民族利益等，对上述议题都有较为积极的立场，体现了较高的议题整合度。欧洲发展公民党的胜利在于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比民族运动党更加辛辣，比攻击党更温和且具普遍性，比主流政党更善于煽动。在多危机难于解决的情况下，善于“政治化”议题的民粹政党成为保加利亚政治的常态与“主流”。

（二）保加利亚选民对民粹政党的选民投票行为分析

除2005年大选以外，从2001年至今的五次大选，民粹政党都为第一。最近四次大选欧洲发展公民党平均投票份额为34.1%，加上攻击党（7.56%）等其他民粹政党的投票份额，保加利亚近半民众将票投给民粹政党。

1. 转型使保加利亚选民基础发生保守主义与本土主义的转变

保加利亚被归为转型“迟缓组”（laggard group），在各项指标上都远远落后其

^① Kristen Ghodsee, *The Red Riviera: Gender, Tourism and Postsocialism on the Black Se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9.

^② Erik Jones, “Populism in Europe”, *SAIS Review*, Vol.27, No.1, 2007, pp.37-47.

他中东欧国家，目前是中东欧负债率最高的国家。^①保加利亚也通过对外开放经济、价格自由化、废除中央计划经济等手段推进生产系统的转型，但由于政治改革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有官员和制度；而历史民族冲突又突然尖锐起来，少数民族呼吁权利，种种原因拖慢了改革进程，使经济政策不连贯，也使得民众之间嫌隙不断，缺乏改革共识。转型最初十年，GDP年均负增长3.6%。直到2007年加入欧盟那一年，人均GDP才追上1989年的水平。首先，从内部来看。矿冶、能源和农业是保加利亚的支柱产业，附加值低，财富由寡头垄断，民众从中分享的财富少。失业率和工资问题上，保加利亚的转型与邻国存在较大差距。10个保加利亚人里有4个处于贫困风险之中，为全欧盟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平均退休金只有190欧元。其次，从外部来看。西方资本对保加利亚的投资完全是政治性的，以入盟为导向，拓展西方集团的势力范围。外商投资在1991年至1996年间仅为GDP的1%；1997年至2002年间为GDP的5%；2003年确定入盟时间后连年激增，均值为GDP的17.8%，2007年更达到31%。从2008年至今，年均投资仅为GDP的5.2%，被称作“外资崩溃”。^③在上述转型后一内一外的不利局面下，四分之一人口背井离乡，高教育人口中50%的年轻人离开保加利亚，大部分都不愿意回国发展。^④56%的人表示移民是为了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⑤文凭、语言、资格证书等社会资本促进了高素质人才加速迁移，本土主义者被拦在国门之内，成为民粹政党拥护者。

2. 保加利亚民众对主流建制的失望逐步增加，民粹政党善于放大民间焦虑

学者指出，保加利亚等国在转型危机与靠近西方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是被迫接受

① Achim Ahrens, Joachim Zweynert, “Conditionality or Specificity? Bulgaria and Romania’s Economic Transition Performa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Vol.24, No.2, 2012, pp.291-307.

② 参见欧盟统计局数据：Income Quintile Share Ratio, ratio<https://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table&init=1&language=en&pcode=tessi180&plugin=1>.

③ Martin Dimitrov, BIRN, “Foreign Investment Has ‘Collapsed’, Say Bulgarian Industrialists”, 28 August, 2018, <https://balkaninsight.com/2018/08/28/bulgarian-industrial-association-announces-total-collapse-of-foreign-investment-in-the-country-08-28-2018/>.

④ “More Than 280,000 Bulgarians Are Ready to Emigrate”, *Sega*, 31 August, 2012, <http://www.segabg.com/article.php?id=614509>.

⑤ Yoanna Ivanova, Zornitsa Stoilova, Anina Santova, “How Many Bulgarians Live in Europe? And What Are the Trends in Their Mobility?”, 10 September, 2019, <https://www.europeandatajournalism.eu/eng/News/Data-news/How-many-Bulgarians-live-in-Europe-And-what-are-the-trends-in-their-mobility>; China-CEE Institute, “Bulgaria Social Briefing: Nearly 2.5 Million Bulgarians Live Abroad”, 19 December, 2019, <https://china-cee.eu/2019/12/19/bulgaria-social-briefing-nearly-2-5-million-bulgarians-live-abroad/>.

西方改造，“没有选择的民主”，这反而让人们产生反对所谓政治共识的态度。^①此外，保加利亚政府效率较低，腐败又是转型之后的普遍现象，作为民众关切的首要问题，腐败引发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不满。调研表明，75%的保加利亚人认为政客的腐败导致司法系统危机，司法不公现象频发。^②欧洲议会议员安德烈·科瓦切夫（Andrey Kovatchev）认为，腐败是过去的制度没有彻底转变的结果，是“可悲的政治转型”。^③随着腐败和生活质量的恶化，人们对政治和选举的信心连年下降，74%的人对政治丧失信心，仍认可政治的人仅为11%。^④加入欧盟才刚两年，就有76%的人表示对民主制度不满。^⑤由于对制度的认可度不足，选民对投票的兴趣也在下降，1991年投票率为83.87%，2009年投票率一路降至60.64%，2017年只有54.07%的人参与投票，充分表明公众对转型后政治建设的失望。2011年，中东欧转型基本接近尾声，《转型国家》报告指出保加利亚排名不理想，包括选举制度、市民社会、独立媒体、民主治理、司法系统、腐败与透明等指标上均较为一般，与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差距较大。^⑥2014年，当被问及保加利亚是否已经实现转型时，只有2%的人认为已经完成转型，大部分持否定立场，还有25%的人认为永远不可能实现。^⑦体现人们对民主制度、主流建制、转型路线的失望。同时，民粹政党利用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策略放大民众焦虑，收获颇丰。以炒作民族矛盾起家的攻击党为例，难民危机后频繁煽动民众，并以“圣战暴民（jihadist mob）”等词侮辱性称呼穆斯林难民，并抨击主流建制。然而难民的终点是发达的西北欧，几乎没有愿意留下的，2016年保加利亚还拒绝了85%的难民

① Ivan Krastev, “The Strange Death of the Liberal Consens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8, No.4, 2007, pp.53-63; James Dawson, Sean Hanley, “What’s Wrong with East-Central Europe? The Fading Mirage of the ‘Liberal Consens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7, No.1, 2016, pp.20-34.

② Novinite, “Bulgarians See Politics, Hospitals, Customs as ‘Most Corrupt,’” 27 July, 2016, Poll <https://www.novinite.com/articles/175642/Bulgarians+See+Politics%2C+Hospitals%2C+Customs+as+%27Most+Corrupt%27+-+Poll>.

③ Debating Europe, “Is the Transition to a Full-fledged Democracy Working in Bulgaria?”, 9 June, 2015, <https://www.debatingeurope.eu/2015/06/09/democracy-bulgaria/#.XiflO1MzYUs>.

④ Steve O’Brien, Julie Ray, “Poll Turnout Confirms Bulgarians’ Lack of Faith in Elections”, 29 May, 2019, <https://news.gallup.com/poll/257870/poll-turnout-confirms-bulgarians-lack-faith-elections.aspx>.

⑤ Matthew Brunwasser, “Bulgaria Still Stuck in Trauma of Transition”, *New York Times*, 9 November, 2009, <https://www.nytimes.com/2009/11/11/world/europe/11iht-bulgaria.html>.

⑥ Freedom House, “Nations in Transit 2011”,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nations-transit/nations-transit-2011>.

⑦ Erste Stiftung, *Transition and Happiness- a Bulgarian Paradox?*, December 2014, https://www.esiweb.org/pdf/esi_document_id_158.pdf.

入境申请，进入保加利亚的难民少之又少。^①但情绪引导还是为攻击党带来巨大选票收益，2014年难民危机前的大选中得票率为4.52%，2017年大选为9.07%。

3. 保加利亚主流政党绩效差，民粹政党不断提升附加值

面对经济与腐败等转型问题，半数以上的保加利亚人认为政府在若干问题中负主要责任。^②实际上从转型之初，主流政党就不是通过良好的绩效得到选民的认可，而是把自己定义为“保卫受害者”的身份，博取正当性认可。社会党声称为共产主义制度在保加利亚倒下后那些潜在利益受损者提供保护，认为宪法必须“以人民比国家更有权力”为宗旨，并呼吁直接民主。社会党还警告转型的高成本、高负担以及文化独特性上的损失。民主力量联盟则把自己定义为保加利亚共产党执政时期受损害的那些人的保卫者，声称保护“不人道的集权制的受害者”，因此代表“逃离旧制监狱的千千万万牺牲者的意愿”。权利与自由运动始终坚称土耳其人才是真正的社会底层，受保加利亚人压迫。^③这导致民众对政治共识存在疑惑，主流政党能带来的潜在收益是非常模糊的，预期收益比并不高。随着社会发展一直处于尴尬境地，包袱更小的民粹政党进入选民视野。民粹政党善于竞夺选民的正当性授权，塑造高回报附加值。如西美昂二世，作为目前在全球最后一位在世的二战时期国家元首，也是少有的在退位后通过民选成为政府首脑的领袖，就善于利用保加利亚人因遭受现实不满而对辉煌过去的回念来吸引选民，使用“使命”、“命运”、“苦难”、“信仰”、“牺牲”、“信念”、“精神复兴”等古老华丽的语言建立慈父般的、受人爱戴的国王形象。^④而攻击党党首沃伦·西德洛夫（Volen Siderov）展现了捍卫主体民族的街头革命者形象。无论是个人形象还是言论，选民看到了投资民粹政党的低成本和高回报。主流政党则“除了讲废话什么都不会”。^⑤但值得关注的是，民粹政党在执政后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民意的“死亡交叉”。如2001年至2005年执政的民族运动党，上台之初的支持率达

^① Asylum Information Database, “Country Report: Bulgaria”, 2016, <https://www.asylumineurope.org/reports/country/bulgaria>.

^② Novinite, “Gallup Survey: Half of the Bulgarians Think that the State Is to Blame for Their Problems”, 21 August, 2019, <https://www.novinite.com/articles/199527/Gallup+Survey%3A+Half+of+the+Bulgarians+Think+that+the+State+Is+to+Blame+for+Their+Problems>.

^③ Christiana Cristova, “Populism: The Bulgarian Case,” *Societate e Cultura*, Vol.13, No.2, 2011, pp.221-232.

^④ S. Malinov, “Размисли за българския популизъм,”（《对保加利亚民粹主义的思考》）*Critique & Humanism*, Vol.23, No.1, 2007, pp.71-84.

^⑤ M. badzhakov, *Political Correctness vs. Liberal Tolerance*, Sofia: Helikon, 2010, p.132.

81%，四年后仅为27%；不支持率则从12%升至71%。^①民粹政党为自己打造的高投资回报率的形象只是“空谈政治”而已，仅是笼络选民的选举策略。

4. 较强的选举波动性之下，保加利亚民粹政党的政治机会层出不穷

1991年保加利亚转型后的首次大选，参选的政党不计其数，获得选票的政党总计37个，1994年更是高达46支党派参与选举，2017年有20支政党获得选票。保加利亚初期的选举制度对党派几乎没有限制，致使各路党派层出不穷，政局混乱。保加利亚政坛高度分裂的原因在于三点：一是转型没有给民众建立起对主流政党的依附感；二是新党派出现或改组的成本较低；三是党派间缺乏政治共识，竞选联盟内部不稳定。如笔者的统计，历届政党竞争都是十分激烈的。

表1 保加利亚历届选举的政党及份额统计

	收获选票的党派或党派联盟				收获议会席位的政党（4%门槛）			
	总计	老党	新党	新党占比	总计	老党	新党	新党占比
1994	46	22	24	52%	5	4	1	20%
1997	35	19	16	46%	5	4	1	20%
2001	36	11	25	69%	4	3	1	25%
2005	22	14	8	36%	7	4	3	43%
2009	18	11	7	39%	6	4	2	33%
2013	36	13	23	64%	4	4	0	0%
2014	25	11	14	56%	8	6	2	25%
2017	20	8	12	60%	5	4	1	2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基于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官方数据。^②

此外，保加利亚选举门槛相对较低，对极端政党没有立法限制，同时在竞选资金、竞选广告宣传等方面也缺乏强制标准。这一现象在1990年到2005年间的转型期内十分明显。直到2005年才做出一些立法规定，如要求参选党派需要提交5000份的签名登记和至少20000保加利亚列弗的竞选保证金等，从而过滤掉许多小党派。^③2010年

^① Alpha Research Database, “Attitudes towards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https://alpharesearch.bg/monitoring/27/>.

^② 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 <http://results.cik.bg/>.

^③ Ekaterina R. Rashkova, Maria Spirova, “Party Regulation in Post- communist Bulgaria,” *Working Paper o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2012, No.21.

欧洲发展公民党上台后，频频通过议会设立对自己有利的法规，选举门槛大幅提升。近期如 2019 年取消企业和个人对政党的资助限制，并减少政府对政党的补贴。一来导致了腐败，二来打压了那些依赖国家补贴的小党派。因此从选举规制为民粹政党提供的机会看。一方面，随着 2009 年欧洲发展公民党执政，保加利亚政治分裂的情况有较为明显改善，竞争相对稳定，选举波动性逐步下降。并且，新的民粹政党在 2009 年之后也较前一段时期有所减少。一是说明相比于主流政党，民众更认可民粹政党的事实。二是说明在主要民粹政党垄断底层选民与打压小党的情形下，竞争机制逐渐封闭，选票难以流入新的民粹政党。另一方面，民粹政党权力激增的时段与选举波动性突然提升的时段相关。2001 年民粹政党首获大选胜利，2009 年又换了另一支民粹政党上台，这两届的波动性指数是最高的，分别为 48 和 44。可以推断，各路小和新的民粹政党借助所在时段政治分裂度较高的现实，炒作时下热门议题，使民众的选票变得更加分散。这说明选举系统本身就是一个为民粹政党提供机会的条件。普遍来看，在转型不完善的背景下，新的边缘民粹政党往往利用高度分裂的政治现实，通过煽动选民，达到进入政治赛场的目的；当选举规制提供的通路因人或结构因素而逐渐收窄，民粹政党兴起的时机就相应变小。



图 2 保加利亚历届选举的波动性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基于“彼得森选举波动性指数”统计方法。^①

^① 基于彼得森指数统计方法，笔者计算了 1994 年至 2017 年保加利亚 8 次大选的选举波动性指数（精确到个位）。方法参考：M. N. Pedersen,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hanging Patterns of Electoral Volat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7, No.1, 1979, pp.1-26.

综上，保加利亚作为一个转型质量一般、民粹政党繁荣的国家，比较有代表性地表明中东欧转型以来存在的普遍现象。选民的投票行为直接引发民粹政党在选举中的胜利，而投票行为又由选民的构成、心理偏好、成本收益考量和选举规制四个关键因素直接导致。本文的四个假设得到合理验证。

由于晚于西欧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孱弱的民主制度和政党根基、顽固的民族文化基因等因素，中东欧民众对主流建制没有深刻的认知，使得中东欧的政党制度自转型之初就显得不那么健全，一切转型以来的负面问题都通过选民的“投票行为”加以整合，最终演变为民粹政党通过选举得以崛起。理解中东欧选民对民粹政党投票行为的发生机制，有助于理解当下中东欧的政治现实，更有助于通过当代中东欧的“民主倒退”透视西方新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归根结底，民粹是“代表者（政党）”和“被代表者（民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起的一座桥。而这条愈加断裂的鸿沟本就是主流政治所制造的产物，集中体现为丧失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是几十年来西方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的悲剧结果。在真正以人民为落脚点的改革发生前，民粹政党会一直得到民众响应。正如学者的一句发人深思的观点，“民粹主义虽不会持续太久，但它会一直在我们身边。”^①

【收稿日期：2020-01-08】

【责任编辑：何宗强】

^① Kevin Deegan-Krause, “Populism and the Logic of Party Rotatio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n: Martin Bútorá et al., *Democracy and Populism in Central Europe*, Bratislava,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 2007, pp.141-159.